



2024年2月2日
星期五

第 2052 期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主管主办 网址: http://www.studytimes.cn
报名题字: 江泽民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11-0137 代号: 1-267

把传统农业大国引入现代化轨道

□ 王 颖

为了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之路，毛泽东进行了不懈追求和探索，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他带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把积贫积弱的传统农业大国引入现代化的轨道，既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创造了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政治条件，也为现代化在中国的长远发展指明了方向、打下了基础、擘画了蓝图。毛泽东由此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奠基者。

指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惊醒了国人：中国必须尽快实现近代化（即现代化），否则永远摆脱不了落后挨打的命运。那么，如何才能在一个农业文明的废墟上点燃现代化的火种？中国各派别努力从武器、技术、思想、政体等层面效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结果却不尽如人意，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相继以失败告终。

这些惨痛的历史教训与中国的特殊国情，使毛泽东逐渐认识到，西方现代化的理念与模式并不能给中国带来发展前途。为什么学习西方的路走不通、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毛泽东也清醒地看到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性和物化立场的伪文明性。早在1917年他就说过，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迷茫的中国人带来了光明和希望。毛泽东在纷然杂陈的外来思潮中，经过反复比较和鉴

别，毅然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认定中国的出路只能是社会主义。毛泽东深刻分析中国的特殊国情。鉴于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落后分散的小农经济、小生产及其社会影响根深蒂固，又遭受着西方列强侵略和压迫的状况，他认为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构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框架，并回答了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农业国家民主革命胜利后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从而确定了社会主义的方向和路径，使中国的现代化由空想开始变为现实。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成功走出一条中国式的革命道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彻底结束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屈辱历史。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新中国的成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根本政治条件。

奠定中国现代化的制度和物质基础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过去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和连年的战争破坏，经济基础、技术基础和人才力量非常薄弱。当时，现代工业不到国民经济的10%，全国钢产量只有15.8万吨，“一

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深知“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肩负起带领人民进行工业化、现代化建设、赶超先进国家的历史任务。

要在较短时间内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必须从重工业建设开始。但是，“如果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的农业手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而听其自流，那么它们就不但不能认真地支持社会主义工业的发展，而且必然会对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事业发生种种矛盾”。毛泽东清醒地看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社会主义是较快实现工业化的发展道路。1953年，他提出了以“一化三改”为主要内容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从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和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现代化事业大踏步前进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

在工业化、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毛泽东始终强调，“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的出路”，决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1953年，在酝酿“共同富裕”概念时，他明确提出，“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1957年，面对国际国内复杂形势，他毫不动摇地宣告：“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点，甚至连国外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了。”毛泽东认为，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优秀成果，但是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根据中国需要进行独立自主的学习，必须“洋为中用”，坚决反对“全盘西化”。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改革开放前尽管出现过曲折，但仍取得了巨大成就。不仅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

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速发展。据统计，1952—1978年间，中国的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6倍，年平均增长率为11.3%。工业产值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由1952年的19.5%上升为1978年的46.8%。煤炭、化肥、天然气、原油开采、汽车、飞机、导弹、坦克等工业部门实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迅速发展，很多产品和设备基本上实现了自给。“两弹一星”等现代化国防尖端技术的掌握，为维护国家安全提供了坚强后盾。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事业蓬勃发展。1949—1978年间，15岁以上人口文盲率由80%下降到25%，国民文化素质普遍提高。毛泽东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为之后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积累起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

探索适合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在现代化的起步阶段，关于选择什么样的现代化模式，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由于缺乏经验，只能将目光投向现代化的先进国家。毛泽东在深思熟虑后，作出全面学习苏联经验的决定。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在1952年底基本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后，制定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并在苏联协助下编制和实施“一五”计划。这些举措的推进，大幅度提高了我国整体工业水平。

尽管苏联模式呈现出很大的优越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暴露了诸多问题，毛泽东开始考虑“能否不用或者少用苏联的拐杖”，希望“自己根据中国的国情，建设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下转4版）

重要言论

要通过扩大对外开放，提高我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and 能力，增强国际竞争力和规则影响力，稳慎把握好节奏和力度。要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推进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协议中金融领域相关规则，精简限制性措施，增强开放政策的透明度、稳定性和可预期性，规范境外投融资行为，完善对共建“一带一路”的金融支持。

从红山文化看 中华文明起源

□ 沈之骥

红山文化是中国北方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的重要考古学文化，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老哈河流域和辽宁省辽西地区，面积达20万平方公里，年代为公元前4000年—前3000年。红山文化的社会形态初期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全盛时期，主要社会结构是以女性血缘群体为纽带的部落集团，晚期逐渐向父系氏族过渡。红山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彩陶与细石器并存，还有大量的玉器和祭坛、神庙、积石冢等祭祀用大型礼制建筑。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早期的一脉强劲力量，助推中华文明向前发展，也见证了5000年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

红山，意为“红色的山峰”，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东北郊的英金河畔。红山在蒙古语中称“乌兰哈达”，“乌兰”意为赤色、红色，“哈达”意为山峰，赤峰这个名字就是从“乌兰哈达”而来。红山文化因赤峰市的红山而得名。

1930年，我国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在赤峰红山脚下英金河两岸和红山后进行调查，并著文《热河查不干庙址西双井赤峰等处所采集之新石器时代石器与陶片》，对红山地区古文化进行了初步分析和研究。同时，他还与考古学家裴文中、尹达对红山地区古文化提出了许多预见性课题。

1950年代初，尹达在《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中，根据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所长梁思永意见，第一次将在赤峰红山地区发现的、以彩陶和细石器伴生为特点的新石器文化遗存命名为“红山文化”。与此同时，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人员先后对红山地区的古文化遗存进行发掘和研究，从此我国正式开始对红山文化进行研究。

从1970年代起，考古工作者对红山文化的探索工作取得一系列重大发现，主要包括内蒙古翁牛特旗红山文化玉龙、各地红山文化玉器群，辽宁朝阳喀左东山嘴红山文化大型祭祀遗址，辽宁建平县、凌源市交界处的牛河梁大型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遗址，辽宁阜新查海遗址等近千处遗址，使红山文化研究进入新阶段。

1971年，被考古界誉为红山文化象征的“中华第一龙”——红山文化玉龙，在赤峰市红山文化遗址出土，赤峰市也因此被誉为“中华玉龙之乡”。

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龙的精神渗透到中华民族的骨髓和血液之中。红山文化玉龙的发现立即引起学术界关注。目前，红山文化玉龙已在多处发现，其中尤以赤峰市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出土的玉龙最为栩栩如生。

红山玉龙墨绿色，高26厘米，体卷曲，平面形状如一“C”字，形体酷似甲骨文“龙”字。龙首较短小，口闭吻长，吻前伸，略上撇；龙眼突起呈棱形，前面圆而起棱，眼尾细长上翘；鼻端前突，上翘起棱，以对称的两个圆洞作为鼻孔，端面截平，截面呈椭圆形，直径2.3至2.9厘米。颈上有长毛，尾部尖收而上卷，颈背有一长鬃，弯曲上卷，长21厘米，占龙体三分之一以上。鬃扁薄，并磨出不显著的浅凹槽，边缘打磨锐利。龙身大部光素无纹，只在额及鄂底刻以细密的方格网状纹，网格突起作规整的小菱形。玉龙以一整块玉料圆雕而成，细部还运用了浮雕、浅浮雕等手法，通体琢磨，较为光洁。玉龙造型独特，工艺精湛，圆润流利，生气勃勃。玉龙身上负载的神秘意味，更为它平添一层美感。值得注意的是，红山玉龙形象带有浓重的幻想色彩，已经显示出成熟龙形的诸多因素。

红山玉龙的具体用途尚待进一步探讨，不过龙体背正中有一小穿孔，经试验，若穿绳悬起，龙骨尾恰在同一水平线上，显然，孔的位

置是经过精密计算的。考虑到玉龙形体硕大，且造型特殊，因而它不只是一般的饰件，很可能是礼制用具。

红山玉龙的发现，充分印证了中国玉文化的源远流长。中华民族向以龙的传人自居，龙的起源同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形成和文明时代的肇始紧密相关。红山玉龙对于研究中国远古的原始宗教，总结龙形发展的序列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

而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许多重要发现都与“女娲”有关。牛河梁遗址位于辽宁朝阳凌源市、建平县交界处的牛河梁村，是一处原始社会末期的红山文化遗址。1980年代初，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一座女神庙，并在庙中出土了一尊完整的与真人一样大的泥塑女神头像。女神庙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史前神殿遗址，女神头像被誉为“中华民族共祖”。女神头像面部为朱红色，两颊突起，圆额头，扁鼻梁，尖下巴，与现代华北人的脸型接近。和女神头像同时出土的还有6个大小不同的残体泥塑女性群像。联系中亚曾在人头骨涂泥成像的崇拜形式，牛河梁女神像可能是以现实中的人物为依据塑造出来的。这不单是一种艺术造型，并且可以作为研究古代中华人科学和民族史的典型标本，它使我们第一次看到用黄土模拟真人塑造的5000年前祖先的形象。

在距离牛河梁女神庙一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小土山。经发掘证实，这座土山全部由人工夯筑，夯土层次分明，考古专家称其为中国的“金字塔”。女神庙遗址与“金字塔”在一条南北线上，而东西两侧的积石冢群址与“金字塔”等距离排列在一条线上。关于“金字塔”的用途，有学者推测与传说中的“女娲”有关，因为考察“金字塔”顶炼红铜的遗址，与“女娲补天”传说中“女娲”炼五色石的情节十分吻合。

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指出：“牛河梁遗址坛、庙、冢群的发现，代表了我国北方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她的社会发展阶段已向前进跨了一大步，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五千年文明的曙光。”

如今，“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已经被纳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相关研究将进一步证实红山文化对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的贡献和意义。



求圣贤之道 养浩然之气

《诗经》中的廉洁文化

□ 李媛媛



《诗经》是中国诗史的开端，辑录了从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的诗歌三百余篇。其中有多首诗记载了当时的官员如何廉洁自律、涵养浩然之气；如何治国理政、赢得民心。这些诗篇对于当代的廉洁文化建设仍有重要启示意义。

西周初年，统治者吸取了商灭亡的教训，认识到“宜鉴于殷，骏命不易”（《大雅·文王》），强调要重视天命眷顾，使政权得以永续。周代专门设有名为“行人”的采诗官，通过到民间采诗来了解民情民风民俗和人民疾苦。收集整理后交给太师，演奏给天子听，作为制定政策的参考。当时的上层公卿也会有目的地作诗或采集诗，献给天子，主要是为了针砭时弊、补察时政。所谓“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汉书·艺文志》）。在此基础上，西周建构起了以敬德保民为基础、强调人伦的道德主体性的文明形态，《诗经》中有关廉洁文化的诗篇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得以形成，体现为敬德保民的政治思想、自省自律的修身之道、勤勉奉公的工作作风、安贫乐道的高洁人格和美满和乐的廉洁家风。

敬德保民的政治理念。《诗经》中有多首诗反映民间疾苦，《大雅·生民

之什·民劳》中有“民亦劳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式遏寇虐，无俾作慝”，告诫禁止暴虐和劫掠，不要使百姓心忧。《魏风·硕鼠》直指侵占百姓利益恣意妄为的贪官污吏：“硕鼠硕鼠，无食我黍……无食我麦……无食我苗”。连苗都吃光了，可见其贪婪，由此感叹“逝将去女，适彼乐土”，反映了底层人民对没有剥削的美好世界的向往。《魏风·伐檀》的劳动者发出“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的质疑，反映劳苦民众对剥削者的讽刺与仇恨。相反，如果官员廉洁奉公、一心为民，则会受到民众爱戴和怀念。《召南·甘棠》即为民众表达对召伯的怀念所作：“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剪勿败，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说。”召伯在听民讼时，不占用民屋，在甘棠树下搭草棚，为官清廉，秉公执法，决断公正，正直无私，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民众怀念他，连他种的树都舍不得伤害，表达了对召伯的景仰之情。

自省自律的修身之道。《诗经》中时常对殷商后期纵情色色的奢靡之风加以反省，但并非一味反对享受人生，而是正视人性，承认人有喜欢享乐的天性，对于这种天性，最重要的是理性地对待。如《唐风·蟋蟀》中有“蟋蟀在堂，岁聿其莫。今我不乐，日月其除。无已大康，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士瞿瞿”的描写，蟋蟀又来到堂中，岁月匆匆又到年末了。时光飞逝，人生苦短，人很容易

产生及时行乐的思想。诗中认为享乐是可以的，但不要过分，应当常思自己的职责，不要放纵享乐、荒废主业。贤良之士要时刻警惕、节制和自律，否则就会带来忧患和灾难。

勤勉奉公的工作作风。《小雅·庭燎》描绘了这样一个君臣励精图治的场景：“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鸾声将将。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晰晰。君子至止，鸾声嘒嘒。夜如何其？夜乡晨，庭燎有辉。君子至止，言观其旂。”天还未亮，大臣们就已经来到朝堂准备朝会，却发现庭中火炬在燃烧，说明君主也是夜不安寝，急于处理政务。君臣皆谦恭敬畏，不怠于事，从中能看到政治中兴之象。《召南·小星》则出自一名小吏之手：“嘒彼小星，三五在东。肃肃宵征，夙夜在公……嘒彼小星，维参与昴。肃肃宵征，抱衾与裯。”这位小吏天还未亮就被星戴月出行，从早到晚都为公务忙碌。《诗经》中这类描写小吏或役人的诗很多，他们即便职位低微，却依然尽心尽责、忙于公事。

安贫乐道的高洁人格。《陈风·衡门》以简洁明快的口吻，表达了清廉淡泊之志。“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泌之洋洋，可以乐饥。岂其食鱼，必河之鲂？岂其取妻，必齐之姜？岂其食鱼，必河之鲤？岂其取妻，必宋之子？”柴屋虽简陋，可以栖身。泌水清澈，可以用来充饥。难道我们吃鱼一定要吃鲂鱼或鲤鱼？难道我们要娶一定要娶齐姜或宋子这样的贵族女子？这首诗表达了清贫度日、从容平淡的心态。（下转4版）